

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让主流党史研究强起来*

杨 凤 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其中法学门类新增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上述一系列举动,引发社会热烈反响,也带来了新一波“党史热”。

当此之际,笔者欲就中共党史研究和学界对《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期望谈些看法。首先需要对本题目作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新思潮迭次涌起。对于中共党史学而言,带来实质性影响甚至冲击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实证史学的兴起,一是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前者重史料、史实的搜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于重建历史过程;后者则从国家现代化视角出发,着重历史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现代性的萌生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与博弈等议题,工业与民主、思想观念更新与社会新征候是其言说的聚焦点。这两种史学思潮,对于党史研究重视史料的准确性与多样性、夯实史实基础,对于党史研究者扩展视野、多维度地拓展研究对象,显然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也带来了矫枉过正的问题,忽略甚至蔑视整体性或宏观历史研究,忽视甚至蔑视对历史哲理与规律的探究。在上述背景下,学界提出“把革命带回来”的呼吁,且赢得众多响应者,由此形成“新革命史”热。“新革命史”之“新”主要体现为眼光向下、注重基层社会和微观领域的革命,以区别于重在描绘领导层和宏观革命线条的传统革命史。另外,“新革命史”也没有要把中国近现代历史重新革命史化的意图,它只是让“革命”回归该有的历史位置。不管怎样,“把革命带回来”对于中共党史学而言,是个“利好消息”。

但是,仅仅“把革命带回来”是不够的,在“新革命史”兴起之际,也要把“传统党史(学)带回来”,既要“带回来”还要“做大做强”。那么,何为“传统党史学”?该说法是否科学?实际上,“传统党史学”只是学界的一种说法,并未有人加以严格界定或规范。但大家心照不宣的指向还是明确的,即将政治考量作为首要、以资政育人为旨归的中共党史叙事,进一步言之,即以体制作为强大支撑并且得到官方认可的党史研究,产生于党史工作机构以及高校、党校从事政治课教学的党史和革命史教员。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党史学”也常常被指称为“主流党史学”,以区别于仅反映个人价值、方法论偏好和治学旨趣的党史研究。

但必须马上声明的是,上述所谓“传统党史学”“主流党史学”与纯实证的党史研究或“民间党史学”并非泾渭分明、毫不交集,也不是简单的两军对垒关系,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在许多方面是拥有共识的,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常常带来互补和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我们姑且作如是命名。同时,正如“革命”从未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消失一样,传统党史研究也从未消失,本文所谓“带回来”只是就状况或程度而言,即传统党史学在多元化的学术研究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因而亟须加强、振兴,且面临重要的机遇期。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主题研究”(21&ZD026)的阶段性成果。

“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不是复归过去，不是无视几十年来党史研究新思潮新动态新成果，而是在创造性吸纳所有学术进步与成就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的传统党史学、“升级版”的主流党史学。但是，既然仍以“传统党史学”命名，那么，传统党史学的根基和主要特征就要保留和延续。在笔者看来，传统党史学的突出特征或范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鲜明的资政育人导向，强烈的现实关怀

中共党史的书写最早产生于党内，主要出于将党的重要决策和行动放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进行评估，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考虑。后来，党史又成为对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由此而言，资政育人可谓党史与生俱来的特征。

实事求是地讲，从一般历史学来看，中共党史只是专门史、政党史。中共党史在高校被定位为一个学科，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系统的党史工作部门，这一设置本身便说明，中共党史负有远超一般历史研究的功能，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治国理政密不可分。但是，既然名为“中共党史”，那么党史研究就要遵循一般历史学规范，学理上站不住，根基不牢，其他功能便无从谈起。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否则历史就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绝对的客观立场是不存在的。历史构建尤其是历史评价总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和世界观影响。立场不同，史观不同，历史研究的关注点、解读和评价自然不同，这在党史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

传统党史学的一个特点便是鲜明的党性原则。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敏感度很高，这是学界公认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是一个伪问题，这里的关键就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保持合理张力，辩证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党史姓党”在传统党史学中是坚定不移的。正因为此，传统或主流党史学建构出一种以弘扬党的历史性成就与贡献的宏大叙事，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突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作用，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彰显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历史成就，并从艰辛探索和吸取教训的角度言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曲折，彰显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的创造创新等等，从而发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而站在其他立场上，可能会聚焦于国民党的历史作用，会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曲折。不同的历史建构，都有史料支撑，除了明显以偏概全或者夸大其词的情况外，均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历史的某一面相。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除了材料与认知水平外，无法否认立场和史观的作用。对此，无须回避、掩饰，而是要直面、讨论，并通过论辩，坚定党的立场，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深刻性，增强主流党史叙事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和启发人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感悟历史启示，收获历史“正能量”，而非就事论事、碎片化理解甚至扭曲历史。

进一步言之，首先要强化以学术讲政治的理念和本领。中共党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实事求是或保持正当的客观立场，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是学者和学派进行交流的基础，否则只能自说自话。尽可能广泛地占有各种资料，构建经得住推敲的历史叙事，才能更好地彰显正确的立场和史观。在这里，史学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尤为重要，对史学新思潮新方法的敏感和洞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新发展的敏锐感悟，是主流党史与时俱进的根脉所在，同时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多样化的历史解释，只要遵循学术规范，无论用何种方法、得出何种结论，都有发表和讨论的自由。实际上，大凡有影响的历史著述和研究结论，均有其看问题的独特之处，均能揭开历史的某一面相。多维度的历史解释，正是历史常说常新的原因所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断借鉴、吸纳和批判其他历史研究的成果，是主流党史学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条件，闭目塞听、唯我独尊，在日趋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其次，要进一步强化时代意识和新时代站位，要关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重要战略布局、重要理论创新、重要历史结论，以现实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逆向思考，顺向叙事，梳理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历史由来，不同时期的演变，关节点何在，有哪些历史经验，延续性和发展

性何在，等等。例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新界定，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固定说法基础上，增加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毛泽东思想就开始了，这是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处于向西方寻求真理、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处在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学习苏联以尽快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共产，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今天不同，表现出更复杂的样态。从显性结构看，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赞赏和吸收，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警惕和批判，甚至有时是激烈否定；既有对墨家的高评、对法家的肯定、对道家的客观分析，也有对儒学伦理的审慎、扬弃和以批判为主的基调。这就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客观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体儒学讲“仁”“礼”“中庸”，确实无法为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开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但需要而且可能了。综观一些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传统文化在工业化初期被批判被贬低被遗忘的现象似乎比较普遍，而工业化后期或者说现代化基本实现后，传统文化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复归或传承也比较普遍。仓廩实而后知荣辱，是规律；现代化后而重传统，似乎也是规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隐性结构即深层理念、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来看党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转化与弘扬，这样就更加全面、比较深刻了。

类似由时代认识变化带来的党史研究新课题还有很多，主流党史学对此必须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阐释。实际上，只有关注现实，党史研究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特色，而一般历史学恰恰忌讳甚至反对这样做。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研究都要和现实问题直接联系。实际上，大量的课题是时代意识下历史的新发问新面相的萌发和揭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现实问题的历史回溯还是现实关怀的间接体现，学术性严谨性、“回到历史现场”是第一位的。牵强附会、流于表面、以今度古、非历史主义地去解读和“硬挤”重大问题的历史渊源，只能损害主流党史研究的声誉，而这种现象是大量存在的，需要今后给予高度重视。

二、注重宏观历史，着力于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自下而上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自上而下规划革命、建设和改革蓝图以及制定和贯彻落实中央决策、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加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严格纪律要求等因素，将中央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为重心的党史研究与书写作为传统党史的重要特征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共党史属于政治史，只有关注上层动态和中央决策，才能够清晰地描绘历史的宏观演进轨迹，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影响并非等量齐观，总有关键性事件和人物奠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扭转历史发展方向。传统党史着力于历史节点的梳理和评价、领袖人物的生平与思想，是其对党史学的突出贡献，也是党史学的主干内容，这一优点和优势不能丢。

当然，关注领导层、关注重要问题，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能回避的。大致讲来，有以下一些制约性因素：一是关键事件、核心问题的研究比较难以有效开展，难以提出创新性见解；二是档案史料不够开放，难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三是受现实因素制约，某些问题深入研究难。这些困难确实存在，需要有关部门解放思想、开放档案、鼓励学术研究。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党史研究者只能转而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微观、个案、地方、社会基层。事实上，随着人们对党史与时俱进的新理解，随着一些学术研究新理念新方法的引入，在中共党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依然大有可为。

进入 21 世纪,人们对党史有了“三史合一”的新认识,即除了对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懈奋斗史”的传统关注外,“理论探索史”“党的建设史”日益受到重视,从而拓宽了中共党史主流问题的对象范围,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就理论探索史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但研究着重于最新成果的阐释,着重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解读。也有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史研究,但重文本变化,从理论到理论、从结论到结论的演进轨迹梳理是其显著特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为党的理论探索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理论探索史研究,自然要凸显实证的思想史研究旨趣,更多关注理论背后丰富多彩的实践与时代,关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注思想背后的时代变迁;从中共党史进入理论探索史研究,需要选择一些中观的、具体的核心概念、关键理论命题,运用观念史、概念史等一些新方法,通过仔细爬梳思想史料,进行深度耕犁,避免已有研究过于宏大、空泛的弊端;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理论探索史研究,就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具体成果的分别研究和主要创立者的研究,而是同时要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和不同历史分期为着眼点,看理论探索的接续性、变化性、规律性,看理论探索从“众语喧哗”到“主唱”“合唱”的演进,包括其间“走调”“跑调”的特有价值等。

就党的建设史研究而言,重心一直在理论、在现实,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党的建设史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从历史研究的规范而言,高学术含量的作品不多,多的是粗线条的描绘、大而化之的论说。相较而言,党的组织史研究有所展开。但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回看,许多重要领域、关键问题、核心话题的研讨才刚刚开始,诸如党的自我革命、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内法规建设等等,从历史角度加以梳理和研究,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事实上,即使从“不懈奋斗史”的角度,也依然有大量重要问题等待探究,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研究。党史上的大量档案资料、关键性史料已经公之于世,其他类型的大量资料也有良好条件可以获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缺乏史料,而是缺乏认真沉下心来研读史料的学者,缺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学者,缺乏慧眼识史料、读出史料真正价值的学者。不管怎样,史料永远是史学的基础,传统党史研究依然可以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此外,要关注新思潮新方法带来的新成果,这里主要指“新革命史”“新文化史”尤其是“新革命史”对宏观历史研究带来的挑战和助益。微观与个案研究,聚焦基层社会的研究,展示了自下而上的复杂历史面相,对于扩展传统党史研究的问题域、拓宽传统党史研究的眼界、提高传统党史学叙事的学理性和周延性等大有裨益。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已经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那么,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则急需得到加强。改革开放 40 多年取得的历史进步和成就极其显著,甚至远超预期。改革开放 40 多年几乎占据党史百年的一半时间。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史研究都应高度重视起来。目前,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主要出在经济学领域,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和重心的情势密切相关。但是,党史学者不能因此在改革开放历史研究中缺位失位、无声弱声。实际上,无论就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的宏观构架而言,还是就关键决策、重要问题而言,均需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一系列论断,既为改革开放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课题。由此出发,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史框架、阶段划分如何建构才更科学,基本历史范畴、核心和重要问题

都有哪些等，均需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历史距离现实太近，本身还在延续，因而研究存在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是，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具体问题研究，还是能够开展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萧冬连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出版的《探路之役》便是很好的例子，也可以说是“升级版”的传统党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历史领域内的体现。该书既没有引入什么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框架，也没有运用什么新的研究方法，而是通过丰富扎实的史料和传统的历史叙述，展示了1978年至1992年的改革开放史，赢得学界好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党史研究无须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或分析框架，更不是说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不重要，相反，只要不是削足适履、喧宾夺主或者“新瓶旧酒”般地把所谓新框架新概念套在党史常识上，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常识神秘化，只要运用适度、得当，无疑是有益的。

传统或主流党史学在新时代还有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那就是强化大历史观在构建中共党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方面所能发挥的主导作用。习近平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①，做到以史鉴今。大历史观的突出特点和要求是强调把党的奋斗放在历史长时段里看待和评价，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而不是单一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从人类文明进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发展与制度竞争的宽阔视野中来看待和评价；善于抓住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廓清历史主流主脉，凸显历史发展轨迹和趋势，得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在这方面，习近平的相关论断提供了重要遵循。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500年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走出来”的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结论等，均体现了大历史观的高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新认知。再如，习近平对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具体事件以及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也鲜明地体现着大历史观的视野和方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更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历史决议对百年历史主题的把握，对每个历史时期主要成就的概括，对百年历史经验和百年奋斗意义的总结，既纲举目张又讲清讲实，既架构完整、条理清晰又讲深讲透。这些大历史观下得出的新认识新结论，如何融入中共党史的整体性叙事，如何体现在对于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评价，如何作用于党史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没有真正开始进入研究视野，而这正是主流党史学新的增长点所在。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需要把党的百年奋斗作为一个整体置于近代180年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待，充分认识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转折和改变，也要将其置于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长程中看待，充分认识党的历史奋斗、历史创造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和继承，中国共产党是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光大中华文明，是接着走而非断裂和告别。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视角外，更要看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看待抗日战争，就要深入发掘其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凝成与强化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就要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求历史中，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与使命”及其奋斗历程中，置于战后风起云涌的世界大势中看待和评价，而不是拘泥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也不会简单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举措出发，得出“社会主义早产”“补资本主义的课”“回归新民主主义”等错误认识；从大历史观出发，整体地审视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历史，就会在艰辛探索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看到巨大的历史成就，看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建立对于奠定当代中国一切发展之“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意义，看到通过30年努力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意义，就会客观评价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性作用，就会科学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从大历史观出发，就能在色彩绚烂、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背后，看到其最根本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会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最基础最鲜明的创造创新，就会看到富起来并且正在强起来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显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从大历史观出发，就能更深刻地体察和评价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等等。

大历史观是构建基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而不是某一外来理论或解释框架的宏观历史进程的重要方法论。在自觉的大历史观意识下，在传统党史已有框架和基本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造，打造既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又能体现时代认识水平的中共党史叙事，这是新时代传统或主流党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必须做大做强主流党史的表征。例如，在充分吸收已有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与文明新形态叙事。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方面均有重要论述，在此基础上提炼民族复兴、新现代化史叙事的标志性概念、基本范畴，进而构建叙事主框架、划分历史阶段、进行方法论创新等等，应该会给传统党史学带来新面貌，推动主流党史学与时俱进。

三、注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中共党史学与其他历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注重史论结合。中共党史作为言说对象，最早源于党内解决重大问题的需要，及至延安整风，更成为自觉意识。借助党史的学习讨论以统一思想，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就此有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进行的党史大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上来，坚定不移、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先是在党校作为党性教育的内容进入干部培训课程，接着在高校作为政治理论课或者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内容进入国民教育。换言之，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学的源起，也是党史学科形成的原因。由此，史论结合是必然的要求。讲透历史背后的道理哲理，讲深历史事件的因果链条，廓清历史演进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历史事件、人物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地位与意义等等，这些目标的达成均离不开理论。

就一般历史学而言，求真最重要甚至唯一旨趣。揭开历史学家个人认定的历史真相，历史学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历史哲理、历史启示、历史经验等等，那是哲学家的事情。但主流党史学不能止步于历史过程建构，而是需要再向前走一步，在写“信史”的同时要有理论思考和历史解析，特别是在存有重大争议的历史曲折问题上更需如此。例如，金春明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三个循环”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便是史论结合的佳作。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自觉意识愈来愈强、言说频率愈来愈高、论述篇幅越来越长、系统性整体性越来越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视野更加宏阔，站位更加高远，系统性全面性更加显著。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①2016年，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并围绕这一核心要义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从八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2018年，他又用九个方面的“必须坚持”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总结了九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习近平在长征胜利80周年、建军9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等重要节点，均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总结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中大多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换言之，决议对十个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有关论述的再梳理、再阐释、再重申。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历史经验总结，党史研究者更应拿出高学术含量的史与论真正融为一体的研究成果，助力于治国理政，可谓时代重任。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探索、奋斗交织、融合在一起，显示这些经验既具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和主线，又有一个萌生、形成和丰富、调整的过程，要历史地具体地理解和对待。主流党史研究有责任让历史经验总结既高屋建瓴、富有哲学理论又史料丰富、富有历史纵深，真正达到史论融为一体，既引人深思又引人入胜。

史论结合的传统不能丢，但要打造“升级版”，就必须正视问题的存在。其一，论从史出不能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史实基础上。“论”必须建立在“信史”“全史”的基础上，没有准确而全面的史实基础，“论”再多也无说服力。论从史出的“史”，必须是经得起各种史料验证、经得起不同角度观察的“信史”，然后才是解释和分析。结论先行，甚至故意遮蔽人所熟知的历史面相，再正确的“论”最终也立不住，并戕害史论结合的传统。其二，“论”不能过于宏大、机械。史论结合的理想状态是有机融为一体，论在史中，要言不烦，画龙点睛，甚至“大象无形”，隐于字里行间。历史过程叙述告一段落后，再来一节单独的理论思考，有的时候必要，但多数情况下令人感到机械甚至画蛇添足。此外，历史哲思、经验总结中的结论不能过于宏大、平泛。如果所谓理论或经验总结，既可以放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也可以放在另一个问题上，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哲思，问题域的“适配度”才是检验历史哲思程度或者史论结合质量的重要标准。在新时代，打造史论结合的“创新版”势在必行，这是衡量传统党史研究水准和生命力的重要标尺。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刊物，学界期望它在引领党史研究方面发挥旗帜作用，起到学术引领和风向标作用，多登载一些用学术讲政治、反映新时代主流党史研究特色的文章，有意识地组织和登载反映传统党史研究创新性发展的作品，鼓励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传统党史学中的老问题，鼓励传统党史学开辟研究新领域，打造“升级版”的学术成果。《中共党史研究》近些年来也在这样做，希望日后进一步加大力度，进一步增强引领意识，让传统党史研究在建党百年之际“风华正茂”。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与世界史的对话

梁 志

中共党史学科萌芽于延安整风时期，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在学科归属上，中共党史长期被划归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或专业），名称先后有“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等。学科目录经过几次修订和更新，一级学科的地位不断凸显，二级学科的作用渐趋下降，“化实为虚”，日益向学术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